

·域外汉籍·

专栏导言

陈 捷

中国古代曾经有大量文献典籍通过使者、留学生、僧侣和商人传播到朝鲜半岛、日本、越南、琉球以及马来半岛等地,并对当地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产生影响。十六、十七世纪以后,欧洲贸易商船和来华传教士也将中国书籍带到欧洲。十九世纪中叶以后直到二十世纪,伴随中国与世界往来渠道的扩大以及中国社会长期动荡不安等多种因素,更有大量图书文献流入日本以及欧美。历史上不同时期通过各种途径流传至世界各地的这些中国文献,构成了海外公私藏书机构丰富的中国古代典籍收藏的基础,其中不乏中国本土已经亡佚残缺者。系统调查研究海外中国文献收藏状况及其价值,既是了解中国文化在海外传播情况的基础工作,也是全面认识理解中国历史文化的重要课题。此外,受中国文化影响,朝鲜半岛、日本、越南、琉球等国也有悠久的汉文写作历史。调查研究这些汉文著作,也是理解认识汉字文化圈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内容。

中国古代已有关于海外文献的记录。清代到日本长崎的贸易商船带回的日人山井鼎、物观撰《七经孟子考文补遗》以及中国已经亡佚的皇侃《论语义疏》《古文孝经孔氏传》等书籍,曾经激发清代学者对“礼失求诸野”的想象。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杨守敬以驻日公使馆随员身份在日本搜访中国古籍,协助公使黎庶昌编刻《古逸丛书》,回国后出版《日本访书志》和《留真谱》等著作,开启了近代学者系统收集研究海外汉籍的先河。在近现代学术史上,对海外汉籍的调查、介绍和研究曾经有力地推进了古代小说戏曲、古代诗学和文论、佛教等诸多领域的研究。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随着东亚各国学术交流的增多,学术界逐渐关注汉字文化圈各国有关汉籍的信息。1986年9月,首次“中国域外汉籍国际学术会议”在日本明治大学召开,到1995年,这一会议在台湾联合报国学文献馆主持下共召开了十次。2000年,南京大学成立域外汉籍研究所。二十年来,

“域外汉籍”这一词汇越来越为学术界所认知。尽管学者们对“域外汉籍”的定义、范围存在不同看法,甚至对“域外汉籍”这一名称本身持有不同意见,但不可否认的是,随着中国与世界学术交流的不断扩大,随着世界各国藏书机构的开放与文献的数字化公开化,中国学界对中国大陆以外国家地区所藏汉文文献的关注程度的确越来越高。《文献》杂志自创刊以来一直重视对海外中国文献的介绍与研究,“域外汉籍”专栏的设置,也是对这一学术现象的回应。

此次专栏收录的六篇论文主要讨论现藏日本、韩国的中国文献。蒋晓光《日藏马融〈上林颂〉残篇校勘及考证》讨论日藏汉籍中著名的佚存书《文馆词林》中的一个残篇。《文馆词林》这部唐初由许敬宗等人奉勅编纂的多达1000卷的诗文总集在宋代已经散逸,但日本尚有多种抄本残卷传世。日本江户时代儒者林衡编纂《佚存丛书》时收录四卷,传入中国后受到清代学者重视,曾由伍崇曜编入《粤雅堂丛书》。近代以来,随着新资料的发现,中日两国先后出版过多种刻本和影印本,其中以日本汲古书院1969年影印出版的《文馆词林 影弘仁本》最为完备。罗国威教授据该本整理《日藏弘仁本文馆词林校证》(中华书局、2001)出版之后,国内学者对《文馆词林》的利用研究明显增多。从《文馆词林》发现、出版与研究的历史,也可窥见日藏汉籍研究进展的一斑。关于本篇论文讨论的这一卷次、篇题、作者不明的残篇,近年已有学者认为是马融《上林颂》残篇,但也有学者持不同见解。蒋晓光在罗氏整理本基础上对作品文本进行校勘,通过文本分析以及对东汉皇帝校猎记载等相关文献的梳理,支持该篇乃马融《上林颂》残篇的意见,但将创作年代认定为汉桓帝永兴二年。从这篇论文可见,新文献的发现和引进固然重要,但对文献的进一步研究仍必须细致分析文本和深入理解相关历史文化背景。

伍小劫《韩国藏〈十王经〉异本初探》研究的是刊刻于韩国全罗南道的佛寺证心寺、松广寺的两种《十王经》刻本,作者细致比较了这两种刻本之间及其与敦煌本《佛说十王经》的异同,认为二者文字虽与敦煌本相同,但图像内容及编排顺序与敦煌本完全不同,是与以往学界所知的《十王经》不同系统的异本。论文还通过分析《预修十王生七斋仪纂要》指出这两种刻本中十王及其从官眷属插图乃举行预修十王仪式时所请对象,十王与眷属名目与《冥道传》有关。带图本书籍在翻刻流传过程中,图像部分往往呈现出与文字部分不同的独特的变异现象。在这个事例中,图像的变化并非只是详简精粗或编排顺序、位置的不同,而是与佛教仪式相关,具有特定的功用,这对我们理解佛教文献中图像的意义具有重要的启示。

钟彦飞《日藏释守仁〈梦观集〉抄本考论》和张静、唐元《日藏孤本黄周星〈圃庵诗集〉考述》分别介绍了现藏日本的两种诗文集孤本。钟彦飞论文考察国立公文书馆藏据明建文三年刻本抄写的元末明初僧人释守仁撰《梦观集》。

因该书与元末另一位僧人释大圭诗集书名相同,导致藏书机构著录错误。论文多方考证释守仁生平事迹,订正国内外藏书机构的错误著录,详细论证国立公文书馆藏本的文献价值。张静、唐元论文考察静嘉堂文库藏明末清初诗人黄周星撰《圃庵诗集》。作者详细介绍该书与其他黄周星传世诗集的异同,根据收录、校改情况及版本特征推断该本是黄周星晚年自编诗集的试印本,并阐述了这一文献对研究黄周星生平及诗歌创作的重要价值。

程国赋、郑子成《日本九州大学藏〈考订按鉴通俗演义三国志传〉考》详细介绍九州大学中央图书馆藏《考订按鉴通俗演义三国志传》残本,根据文字比勘确定其版本系统属于二十卷简本系统中的志传小系统,又通过图像对比分析否定了先行研究认为其插图类似诚德堂本的观点,认为该本插图效仿周曰校本《三国演义》,但艺术风格接近建阳刻本。《三国演义》自问世以来一直是雅俗共赏的畅销书,版本系统错综复杂,其中一些版本只有孤本保存于海外。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在考证时参考了多种海内外藏书机构在网络上公布的古籍图像资料,这也说明古籍数字化和公开化的确为域外汉籍研究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陈广恩《新见日藏文徵明楷书〈惠德祠记〉初探》考察早稻田大学图书馆所藏日本江户时代翻刻《惠德祠记》,对其中所记明代官员陈琳的事迹以及他与书法家文徵明、撰写祠记的岭南儒者黄佐之间的关系做了详细考证。作者肯定这一碑帖内容真实,确为黄佐所撰,但认为文徵明书写《惠德祠记》之事不见于文献记载,且该本字迹与文徵明真迹相差较大,主张该碑并非文徵明所书而是江户时代日本人伪作。近年文史学界越来越重视利用石刻资料,但对雕版翻刻的碑帖文献的史料价值似乎尚未充分认识。《惠德祠记》从文物价值来看或许并非珍稀善本,但作者能够从中挖掘出有助于明代人物研究的重要史料,这一点给我们有益的启示。

最后想指出的是,域外汉籍研究的目的不仅在于发现利用国外的罕见资料,更重要的是开拓研究视野,发现新的问题和观察分析问题的新视角。域外汉籍的生成与传播也是在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下发生的,即使仅限于海外所藏中国古籍的研究,也需要对其抄写、翻刻、阅读等传播与接受的具体过程、文化脉络以及特定的历史环境有比较深入的理解。为此必须更多地了解文献所在国家和地区的历史与文化。我想这也是每一位希望致力于域外汉籍研究的研究者应该而且乐意付出的。